

关怀经济学与投资女性*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佟 新 周旅军 马冬玲

提 要： 本文通过总结各国关怀经济学的经验，倡导回归关怀工作，鼓励与关怀工作相关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从人类再生产的视角反思已有的发展模式。打破公私领域分割的生产模式，回归人类再生产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从竞争型经济发展向关怀型经济发展转型。本文认为在我国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倡导关怀经济学恰逢其时，建立投资女性的经济发展观将有助于社会发展，因此提出投资女性教育、女性创业和重新评估女性劳动，特别是重新评估女性关怀劳动的价值。

关键词： 关怀伦理 关怀经济学 投资女性 公私领域的性别关系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30 多年，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超过 6000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市场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进程对经济增长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有显著贡献：1997 年到 2007 年，市场化改革对各省年均经济增长贡献为 1.45 个百分点，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度达到 39%，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制度带来了增长活力，但亦带来明显的社会问题，包括两极分化、环境遭受破坏等。现阶段，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对中等增长率的接受，以及追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平衡发展。因此，需要在反思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新思路。鉴于此，本文倡导关怀经济学（Caring Economics），从重视女性的关怀劳动来推动从竞争型经济发展向关怀型经济发展的转型。

* 基金来源：本文是陈至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2012 年第一批重大项目（文化类）“男女平等价值观研究与相关理论探索”（12 & ZD035）及马冬玲主持的全联妇联妇女研究所“组织中的职业性别歧视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课题（2014-2016）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思发展模式，重新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来认识发展。倡导从重生产、重利润的竞争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重生活、重人之再生产的关怀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现阶段，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特别需要关怀劳动，关怀经济学的发展正逢其时。第二，以国际视野总结各国关怀经济的经验和公共政策，为推动我国关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三，为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倡导投资女性，这些投资包括三方面：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激励女性创业和重估女性劳动价值。最后，讨论投资女性的政策建议。

一、关怀经济学：从投资女性人力资本到 承认女性的关怀工作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也经历了从重视投资到重视人力投资的过程，特别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重视投资女性人力资本。一方面，在教育、营养和健康上投资女性，提升其能力，有利于男女平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妇女的劳动生产率，且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亦是对未来的投入（Schultz, 1995）。到 21 世纪前后，女权主义学者们更明确提出要将关怀工作带来的效益视为国家财富。

美国学者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 2007 年出版了《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一书，两年后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关怀经济学的理念不仅被她引入课堂，更进入生活实践和制度设计中。她在公司咨询中建议将幼儿园建设在公司内部；她建立伙伴关系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artnership Studies, CPS），在 1995 年发表了《女人、男人和全球生活质量》报告，用三年时间收集了全新的、更可靠的人文指数，证明女性地位处于一个国家生活质量的中心位置。关怀经济学倡导恰当地评价最重要的人类劳动，即关怀我们自身、关怀他人、关怀大地母亲（艾斯勒，2009：3）。

关怀经济学理念需要广泛讨论和重视。当人类面临“文明冲突”的事件时，当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仅被少数人拥有且呈现出严重的社会分化时，我们有必要反思目前的发展模式，重新回归人类生活本身，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人类发展的出路。这需要历史性的反思，思考竞争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是如何越来

越远离人类生活本身的目标？以及它是如何借助人类两性劳动分工模式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异化？关怀伦理和关怀经济学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生活和人类发展。

（一）人类再生产与生产之间重合与分离的历史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马克思在理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时，提出人类劳动的双重属性，即人类是在生产自身的过程中生产出社会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共存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的变迁。现代社会，人类逐渐远离物质匮乏的束缚，进入追求精神与情感满足的阶段。经济学家们常常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或服务型社会转型。但我们注意到，这种转型再现出人类再生产与生产的重合、分离和再重合的过程。

女权主义者将这一历史过程视为人类再生产模式和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型过程。家庭经济史的研究发现，1700年至1950年在英格兰和法国家庭经济中，女性一直是重要成员，形成了具有历史阶段性的三类家庭经济类型。在孩子、未婚女儿、已婚女性、寡妇等不同的女性生命阶段，其经济、社会的角色都是变化的，需要伴随“家庭利益”（family interest）的演变而进行调整。在这里，个体的利益是必须服从于家庭利益的。

第一是家庭经济（family economy）阶段，工作皆是在家庭中完成。生活和工作场所相同，家庭成员是一种“经济伙伴关系”，结婚时男女双方都要贡献基本生活物资给新组建的家庭，例如男人会带来土地，而女人会带来嫁妆等。父母通过掌握家庭资产对孩子的生活拥有了绝对权力。婚姻是女人最好的生存方式。妻子掌管家庭经济，四五岁的孩子就开始干活，他们协助同性别的父母工作。每个家庭成员都为家庭的经济利益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是家庭工资经济（family wage economy）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开始，有酬劳动进入生活，人们开始依靠工资生活，工作从家庭中分离出去。一开始，妇女从事的工作类型很大程度地延续了传统的家庭劳作，工资的大多数用于食品消费。到了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妇女经历了工作的内在循环，女性婚前多在纺织厂工作；结婚后特别是生育后则主要承担育儿的角色；如果丈夫去世或失业，或是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妻子们就从边兼职工作边做家务的状况重返劳动力市场，为家庭增加工资收入。

第三是家庭消费经济 (family consumer economy) 阶段。20 世纪后, 特别是二战后, 人们的生活标准大幅提高, 家庭有了可用于孩子教育、家庭装修等方面的储蓄, 女性则有了更多时间逛街购物。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的生活。

家庭在计划、应对经济和人口压力时, 像具有行为一致性和凝聚力的组织, 它分担责任, 使人类的再生产可以延续 (Tilly & Scott, 1978)。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家庭主义的终结和个体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之前, 家庭成员是一个彼此联合的经济单位, 儿童对家庭温饱做出贡献, 家庭成员必须依赖彼此才满足温饱, 并关注家庭利益; 而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儿童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 父母要出去工作才能供养子女, 由此双职工家庭出现, 人们转向关注个人满足的个人主义 (诺克斯、卡洛琳, 2009: 19)。对现代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有三种观点。一是坚持公私领域分割 (separate sphere) 的观点, 认为家庭和工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工作是公共领域, 理性和竞争是基本原则, 它应当是男性施展才华的领域, 男性有责任赚钱来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家庭是休养生息的场域, 而女性的天地是家庭, 她们要为家庭提供情感性和表达性支持。二是公私领域效应外溢 (spillover effect) 的观点, 认为工作系统和家庭系统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 个体既是工作者又是家庭成员, 只是社会更强调工作对家庭生活的作用, 较少讨论家庭对工作的影响。三是公私领域的相互依存 (system interdependence) 观点, 认为工作和家庭系统是既独立又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前两种观点是一种功能主义固化模式, 将性别分置于两个不同的领域, 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相互依存模式强调多样性, 性别间也是相互依存的 (周颜玲等, 2004: 6-7)。性别劳动分工的功能主义发展模式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 并被固化下来, 成为正常的、自然的历史形态, 似乎是自然的性别气质而非文化决定着这种社会建构。

20 世纪 80 年代, 女权主义学者批判了这种性别分工的自然观, 坚持认为公私领域是相互依存的。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利用公私领域二元分割的方式剥削了女性劳动。公私二元分割的社会建构将女性的家务劳动私人化和隐蔽化, 通过贬低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将人类劳动远离其应有的关怀, 形成了劳动的异化, 但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间的矛盾。

(二) 反思劳动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经济

女权主义学者指出, 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以维护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势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机制，主要从四个方面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一是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提供一个人人（包括男女）平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但事实是，性别结构的已有分化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二是劳动报酬制度。女性的低工资既是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劣势地位的直接表现，也使得她们不得不依赖男人，通过婚姻获取自己无力承担的物品和生活方式。三是商品交换。妻子在家庭中用料理家务、照料丈夫和孩子求得生存，这既使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又强化了她们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丈夫则从工资劳动和家庭性别分工中获益。四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不断产生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合法化，使女性只能从事半日工作或不工作，这强化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女权主义者认为，劳动性别分工是女性劣势地位的根源，性别平等的实现要求消除性别分工的等级化特征，或消除性别分工本身（哈特曼，1997：47）。更为批判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依赖性别原则确立起来的，把女性推向边缘并使其劳动处于次要位置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女性起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规范男性主要、女性次要的性别等级关系之上（扬，1997：96）。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开始，要求摆脱“金丝雀”般的生活状态，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然而，中产阶级女性外出工作导致了一个性别兼阶级的不平等。工作的母亲们需要其他女性来承担她们在家中的工作和育儿责任，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成为低薪的有偿劳动。在新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家庭服务业市场化程度提升，加剧了性别与阶级的不平等。一条以家务服务为需求的全球生产链得以产生，家庭服务业的后备军是那些没有职业技能、甘愿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外来的女性们。不发达地区成为劳动力的输出地，而那里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成为最需要关怀的人。

女权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批判父权制，资本主义借助父权制以低工资雇用大量女性劳动力，使其处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是批判只关心利润，不关心人的需要和福利。当经济发展无视人类的关怀需求时，当人类的再生产发生危机，谁来带孩子、谁来照顾老人都成为问题。我们认为已经到了应当反思现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时候，要将人类的关怀需求纳入发展目标，并恰当评估各种关怀性和照顾性工作的价值。

（三）关怀、关怀工作和关怀经济学

女权主义者重新定义工作和劳动，倡导关怀伦理。“在日益增多的个人、社会和环境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决定性要素：缺乏关怀。……我们需要支持关怀我们自己、关怀他人、关怀大地母亲的经济模式、经济规章和经济措施。”（艾斯勒，2009：3）

关怀经济学建立在关怀伦理的基础上。心理学家吉利根（Carol Gilligan）通过对“不同的声音”的倾听，讨论“关怀伦理”与柯尔伯格等人提出的道德发展理论中的“公正伦理”。她分析了两种伦理的关系以及道德的性别化问题，在对两性道德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关怀伦理，由于女性社会化过程对人际交往的关注，因此产生了对善的关系的关注，因此强调关怀伦理与公正伦理具有同样价值。这种在传统社会中被无视的关怀精神不仅是女性气质的，而是具有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她认为，两种伦理代表着两种道德视角，二者是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Gilligan, 1982）。“女性关怀伦理学”与“女权主义的关怀伦理学”是不同的。前者是将“关怀工作”视作女性气质的，是女性具有的牺牲自我关爱他人的精神；当这种关怀与女性的自我发展对立时，它要求女性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做出自我牺牲。女权主义的关怀伦理学强调人与人的相互关怀，这种关怀的相互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因此女性在从事关怀工作时，也把自身的利益包括进来。关怀是人类的内在需求，而非单纯的女性气质。

诺丁斯（Nel Noddings）在《始于家：关怀和社会政策》中对康德的道德理论提出挑战，反思其有关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控制人类自然的、自私的冲动的说法，指出真正的道德是基于人类对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的固有需求，基于人类同情的能力（Noddings, 1984：5），并讨论了在社会政策中关怀与需求的关系（Noddings, 2002：56-68）。也有研究从当代自然法的理论（contemporary natural law theory）出发，强调关怀的政治理论，具有关怀精神的公民具有社会责任感（Engster, 2004：133）。关怀经济学要求打破传统统治关系的思维，冲破公私领域二元分割的思维惯性，赋予关怀工作应有的价值，其目的是促进人类生存和人类能力的发展，包括人类的关怀能力、意义能力和自我实现的能力。艾斯勒在《国家的真正财富》（艾斯勒，2009：67）一书中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只有妇女做关怀工作的社会，而是一个妇女有平等的工作机会而男女共同在家中分担关怀责任的社会。换句话说，这个目标是要经济与社会体系不再把妇女排除于传统上只留给男子的领域之外，不再把关怀和给予关怀看成只适于妇女或被鄙视的‘娘娘腔’男子。”

关怀工作至少涉及三方面问题。第一，关怀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涉及自我与他人，即提供关怀和接纳关怀。人类的关怀需求和关怀责任是不平等地分配的，社会规范影响关怀分配和关怀责任。第二，对关怀责任的分配与实现涉及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分界问题。第三，关怀责任的实现有不同方式，存在于不同的经济部门，其关怀责任对个人形成压力，会提升机会成本。关怀经济学强调的是关怀工作的价值，并将关怀工作视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怀工作不同于传统的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它涉及人类再生产劳动，特别有关人类代际间生存与发展的劳动。关怀工作是指基于同情、责任的人类对最佳人类发展的关切行为，是给予关怀和接纳关怀的社会关系。关怀伦理和关怀行为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社区、学校、企业和政府政策。

艾斯勒系统地阐述了关怀经济学的建构过程，在创新重视关怀和关怀的文化观念下，建立伙伴主义（Partnerism）的经济理论是实现关怀自我、他人和大自然的重要途径。

（四）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向关怀经济学转型

后工业社会正面临向关怀经济学转型。一方面，是技术对传统工作的替代；另一方面，人们对情感和关怀的需求日益具有了优先性。

技术的变化正在改变工作的可获得性，“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工作依然是社会的中心，人们通过工作获得身份和意义，同时，技术的替代性正在尽可能多地消除工作（Gorze, 1999: 1、53）。贝克指出“我们必须消除和放弃社会身份和地位只取决于一个人的职业和事业的思想，必须使社会的尊敬和安全与工资性就业相分离”（Beck, 2000: 57）。消费取代工作成为建构身份的场域。同时，人类的情感需求正日益变得迫切，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亦具有重要的合法性。

有学者以“外包的自我”的概念来分析当今人类的自我情感困惑，指出关怀工作正在被广泛外包。当有足够的钱来雇人为你做饭时，你会选择雇人来做吗？有70%的人选择愿意。2001年，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死于医院，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护理中心（nursing home）。从2001年到2008年，美国营利型护理业（hospice industry）增长了128%；非营利型护理业增长1%；政府投资型（government-sponsored）增长25%。关怀劳动开始向外移，从家庭移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等。另外，在发达国家，移民妇女进入家庭的劳务工作，从事护理和家务活（Hochschild, 2012: 212 - 228）。

为了人人都有“体面的工作”，照顾、养育和提供关怀的各类工作必须成为有酬劳动和经济总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需要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冷酷，提升人类生活的质量——满足人类情感的需求，使人类生活在具有支持性的社会关系中。由此需要以新的方式分配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重新定义关怀性和照顾性工作的价值。

二、各国实践关怀经济学的努力

联合国在不断倡导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成为今天实践关怀经济学的重要方面。一些政府和大公司亦在尝试提供关怀性政策，这些鼓励关怀性工作的公共政策在一些国家具有优先性。

（一）倡导量化关怀性工作

长期以来，关怀性工作被视作无报酬劳动。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支持要在经济发展模型中加入对关怀工作的经济评估，并努力创新将关怀工作进行量化的方法，认为量化关怀工作的努力是走向关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统计学则忽略了再生产和关怀工作的贡献（Waring, 1988: 15 - 16）。经济学家亦以更广阔的视角分析经济关系（Sen, 1999）。1993年，一些国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开始把家务劳动统计其中，并指出“家务生产总值”（Gross Household Product, GHP）的计算能够得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图景。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讨论了衡量非市场家庭工作的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机会成本法，根据一名女性照看孩子、父母，从事维持生计的农耕或其他无报酬工作，而不是从事有酬工作而损失的工资机会来衡量。第二种是总体替代方法，用家务工作的市场工资来计量。第三种是专家替代法，将厨师、护士、园艺师等专业人士的市场工资综合起来评价家务劳动的价值。这些家庭工作的经济附加值可称为“家务生产总值”，市场经济产生的附加价值可称为“市场生产总值”（Gross Market Product, GMP），由此得出“经济生产总值”（Gross Economy Product, GEP）（Ironmonger, 1996）。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开始使用新的分类统计，估算无报酬劳动产生的经济增长。

2000年,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家务劳动价值在各国GDP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澳大利亚为58%;瑞士为52.3%;最低的日本也有20%。有学者倡导,我国应当在GDP的统计中加入对家务劳动的统计(戴秋亮、詹国华,2010)。

(二) 制定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

政府制定的有利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公共政策被称为“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family friendly policy),其目的是帮助员工实现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关怀性工作计划——婴幼儿关怀、老人关怀和病人关怀等。美国1990年通过《儿童照料与发展资助法》,1993年通过《家庭和医疗休假条例》。这一条例要求,所有雇用50个人及以上的公司要向员工(不分男女)提供12周的假期和津贴,以实现人们要照顾新生婴儿和患病亲属的工作。在德国,劳动者为此能享受14周的带薪休假。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北欧国家在投资关怀性政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相关追踪研究发现,从普遍医疗保健、育儿到宽裕的父母带薪休假等关怀政策,对普遍提高人民生活、人民的幸福感和更有效能和创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2003-2004年度和2005-2006年度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表明,芬兰的竞争力位列更富裕和更强大的美国之前(艾斯勒,2009:14)。

研究发现,关怀伦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美国儿童早期开发计划已经证明这一公共投资产生了12%的回报。参加“高质量早期儿童开发计划的”孩子比没有参加这一项目的孩子,一生中大约可多收入14.3万美元。加拿大则建立了健康与长期关怀部(艾斯勒,2009:14)。

许多国家对关怀性工作给予直接的回报。2006年,智利对低收入家庭中护理卧床亲属的人每月提供40美元的酬劳和培训课程。加拿大、新西兰和一些欧洲国家直接为育儿服务提供津贴,承认关怀性工作的价值。

(三) 工作组织重视建立具有关怀伦理的工作环境

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重视和回报关怀工作,认可关怀工作在提高效能、有效交流和成功协作等方面的作用。一些工作组织制定了“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family-friendly workplace)的制度,包括弹性工时、建立可以带孩子的食堂等,这些政策提升了员工对公司的贡献(Blair-Loy & Warton, 2004)。公司层面的关怀性工作环境包括:工作计划、地点和工作时间的弹性;为照顾孩子和家庭的带报

酬或不带报酬的休假、照顾依赖者从事工作的政策，如可带孩子来工作、照顾基金和社区服务。

至少有六方面与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相关的公共政策：一是为抚育者分担更多的责任，如为员工提供幼儿园或是允许员工带孩子上班；二是弹性工资政策，可随时以灵活的方式支付工资以应对家庭的不时之需；三是弹性工作时间政策，以满足员工照顾家庭的需要；四是家庭休假政策；五是远程互联网工作政策；六是家属福利政策，包括在医疗或出差等方面为家属的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发布的《在商业及管理中的女性：蓄势待发》报告，考察了公平机会政策的作用。报告指出 73% 的受访公司认为他们有公平机会政策，另有约 10% 的公司不知道什么是公平机会政策或者未实行相关政策。大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公平机会政策，最常被采用的政策是产假休假制度（84%），其次是对妇女的技能培训（75%）及对女性的招聘、晋升的评估（70%），晋升执行层的培训（66%），工作家庭平衡政策（62%），顾问指导制度（59%），弹性工作时间（56%），招聘中的性别平衡目标（51%），父亲的育儿假（51%），育儿照料（44%），兼职工作时间（44%），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假（44%）等（观熙，2015）。

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更认可回报关怀性工作带来的积极效果，它能够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调查表明，企业回报关怀性工作带来的益处有：树立了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有利于企业股票价格的提升，也会吸引和凝聚人才。时间弹性政策的实施为公司中较高职位者带来了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工作承诺。其原因在于，它直接作用于人们有关回馈的规则，公司的福利会使从业者更好的回报企业和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Lambert, 2000）。每年《工作的母亲》（Working Mother）杂志都会评出 100 个最好的提供友好型工作环境的企业，包括微软、IBM 等知名公司。

总之，关怀工作正日益得到各国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的重视，制度创新正在发展之中。

三、我国的努力方向：投资女性与回馈女性的关怀工作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依

赖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三种关键性投入，而这三种投入都无法单独依靠市场活动来解决，它们具有“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的特性，这些商品必须像其他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出售（波兰尼，2007：59），这个商品化的过程对社会具有自我毁灭的作用。但是双重运动特征也在19世纪的社会史中显著地呈现出来：市场在不断扩张至全球的同时，社会也在建立起自我保护的机制，用各种政策和制度抵制过度商品化的危害（波兰尼，2007：103）。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单纯依靠货币资本投入、土地财政和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不仅难以长期持续，而且破坏了环境和社会和谐，限制了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护自己的力量一直存在，包括家庭中的相互支持和社会组织的发育。因此应高度重视保护社会，特别是保护家庭，呵护人的再生产。投资女性与回馈女性的关怀工作有助于保护社会、家庭和谐与社会发展。

要充分认识我国的女性劳动力是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她们在我国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同时，她们对家庭和社会可持续生计的贡献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投资女性意味着重视女性人力资本投入、创业机会和重估关怀工作的价值。

（一）充分认识我国女性劳动力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男女平等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虽然经历了市场化冲击，但我国女性劳动力依然保持了世界性高水平的就业率。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71.1%，城镇为60.8%，农村为82.0%。女性是城乡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在报酬、就业结构以及工作和家庭平衡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第一，两性收入差距明显，并有扩大态势。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18-64岁城镇在业女性（不含退休后再就业）的人均年劳动收入为21249.2元，是男性收入的67.3%；乡村在业女性的人均年劳动收入是男性收入的56%。市场化转型加剧了两性收入差，1990年女性劳动收入是男性劳动收入的81.7%，2000年城乡女性劳动收入分别是男性的70.1%和59.6%。这种性别收入差并没有因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有所改变，从城乡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来看，京津沪、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均低于同地区的男性（蒋永萍、杨慧，2013）。

第二，两性就业结构存在差异，女性更多地集中在发展机会少、收入低、稳定性差的工作中。研究发现，2010年，城镇女性在业者中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

51.6%，比十年前高10.6个百分点，比同期男性高5.0个百分点。2010年，正规就业中的女性收入为男性的87.3%，而非正规就业中女性收入则为男性的49.1%，女性处于更为弱势地位（杨慧、蒋永萍，2014）。两性就业结构的差异是决定两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首先，就业结构中存在性别垂直隔离，且市场化不断加剧性别的垂直隔离（童梅、王宏波，2013）。2010年，在各类组织的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为29.8%，在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28.2%，越往高层女性比例越低。2009年，地厅级女干部和省部级女干部的比例分别为13.7%和11%（吴伟，2012）。其次，职业的性别隔离。女性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5.3%、14.5%和40.2%，女性主要在农业和服务业工作（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这些行业属于收入偏低的行业。研究显示，目前国有部门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职业的性别隔离，但在非国有部门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是决定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吴愈晓、吴晓刚，2009）。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商业、服务业人员中51.7%是女性（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2012：40）。城乡低收入组中，女性分别占59.8%和65.7%，比男性高19.6个和31.4个百分点。城镇和乡村的高收入组中，女性占30.9%和24.4%，明显低于男性（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

第三，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关系中，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弱化了女性的市场地位，女性被迫进入那些非正式的、有时间弹性的低收入职业。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对女性职业的选择是通过工作时间体现的，女性兼顾家庭的责任使其选择更灵活的工作，甚至女性会间断工作，这增加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张成刚、杨伟国，2013）。城镇女性有30.8%会因为生育和照顾孩子的原因而中断工作（佟新、周旅军，2013）。

上述种种表明，女性市场中会因为其性别角色和家庭责任而处于弱势地位；投资女性是用社会的力量改善女性的不利地位，重新认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其关怀工作的价值也因而变得重要和迫切。

（二）投资女性教育能够提升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依靠教育深化来扩大劳动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09）。在性别平等的意义上，投资人力资本要关注性别差距，消除人力资本性别

差的过程就是加大投资女性人力资本的过程，具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近年来，我国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正在显著缩小。从小学净入学率来看，2011年学龄（男女）儿童的净入学率达到99.8%。普通高中学生中女生比例为48.98%。高等教育阶段，女性参与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到2010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女生、女硕士生、女博士生分别占相应总在校人数的50.86%、50.4%和35.5%（中国非政府组织CEDAW^①报告撰写小组，2014）。同时，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提高，18-64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比2000年提高了2.7年，性别差距由十年前的1.5年缩短为0.3年，但深入分析会发现，女性中接受过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占33.7%，城乡分别为54.2%和18.2%；中西部农村女性中，这一比例为10.0%，比该地区农村男性低4.6个百分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

在培训方面，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针对不同的妇女群体提供技术培训及资金和项目支持，促进妇女创业，帮助农村妇女脱贫致富。农业部制定的《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2003-2010年）》中强调动员和鼓励农村妇女享受相关教育资源。农村妇女现代远程教育于2009年首播，面向广大农村妇女开展常规性培训。教育部与全国妇联在2010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不断改善农村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其发展现代农业能力，提高其创业就业能力。各地妇联创办15万所农村妇女学校、创建20余万个各级各类农林科技示范基地，对农村妇女，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妇女进行实用技术和相关知识的培训（中国非政府组织CEDAW报告撰写小组，2014）。

本文将投资女性教育、贷款和女性从事有酬劳动作为变量来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在2010年的数据中缺乏分地区分性别的相关指标，我们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中拟合出反映各省市投资女性的自变量。反映投资女性的自变量使用了教育、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女性参加培训、女性中获得过贷款的比例和女性劳动力平均劳动收入^②。得出的各省市的状况见表1。

①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② 数据为：B2 不包括成人教育，您总共上了几年学？（计算女性的平均在校受教育年数）；B3a 您目前的教育程度是？（仅计算各省区的女性中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B6a 近3年来您参加过培训或进修吗？（计算女性中参加过的比例）；C12a 您是否获得过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计算女性中获得过贷款的比例）；C18a 去年您在以下方面的个人收入大约为多少元？A 劳动收入。

表 1 2010 年各省市投资女性的状况

地区	平均在校受教育年数 (年)	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	参加过培训的比例 (%)	获得过贷款的比例 (%)	上年的平均劳动收入 (元)
北京	10.44	27.3	27.4	2.0	14602.49
天津	10.02	22.1	15.0	1.1	11990.23
河北	9.07	16.1	15.6	4.3	8274.61
山西	8.94	15.7	14.6	6.4	7028.39
内蒙古	8.30	10.3	13.0	21.0	9589.12
辽宁	9.26	14.6	15.6	7.9	8630.99
吉林	8.95	9.8	14.4	15.1	8001.05
黑龙江	8.50	8.3	12.1	17.9	8210.25
上海	10.41	26.1	26.6	0.9	22718.95
江苏	8.89	12.8	15.2	5.5	14437.05
浙江	8.53	16.0	21.4	7.1	18352.97
安徽	8.19	9.2	15.3	6.8	9737.20
福建	8.45	13.0	20.0	8.9	11409.36
江西	7.71	7.7	13.0	10.9	8042.74
山东	8.73	14.4	13.7	6.2	9995.61
河南	8.82	12.1	15.5	7.5	7420.46
湖北	8.52	9.6	14.0	11.7	9636.69
湖南	8.52	9.5	15.5	11.9	8983.98
广东	8.53	12.0	14.2	4.5	10936.84
广西	7.93	9.4	15.2	13.9	7785.68
海南	8.89	10.4	17.5	7.7	8648.14
重庆	8.26	10.5	15.6	13.6	9549.00
四川	8.20	10.1	17.8	17.6	8932.47
贵州	8.22	10.6	13.1	18.4	8677.54
云南	8.15	13.2	19.4	17.5	9416.31
陕西	9.22	13.4	19.8	13.1	9657.42
甘肃	9.08	11.9	17.6	16.9	8241.44
青海	9.14	17.2	21.8	11.1	10741.85
宁夏	8.87	13.7	21.7	15.4	10375.54
新疆	8.90	19.3	24.0	19.2	15036.58

注：(1) 由于西藏的样本数过小，分析中不包括西藏；(2) 由于兵团缺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及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故也不纳入相关分析；(3) 本表格中数据仅涉及各省市女性的情况。

根据表 1 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天津三地投资女性教育的程度最高。平均收入状况以上海为最高。老、少、边、穷地区女性获得过贷款的比例较高。

再以全国各省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GDP，单位为元）、地区发展与民

表 2 2010 年各省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数

地区	人均 GDP (元)	DLI (调整后) (%)	综合发展 (%)	经济发展 (%)	民生改善 (%)	社会发展 (%)	生态建设 (%)	科技创新 (%)
北京	73856	85.33	85.05	96.13	90.63	82.17	74.38	78.38
天津	72994	74.90	72.65	87.56	80.49	70.16	70.02	46.24
河北	28668	56.60	53.71	58.00	62.35	66.11	56.34	13.22
山西	26283	54.54	53.41	60.80	58.39	70.41	51.53	12.71
内蒙古	47347	54.69	53.42	67.80	58.54	66.71	51.39	7.89
辽宁	42355	61.21	59.71	72.69	65.92	68.47	58.13	20.70
吉林	31599	57.21	55.41	63.62	61.82	72.08	53.70	11.67
黑龙江	27076	54.82	53.26	64.34	60.61	65.35	51.00	11.34
上海	76074	82.49	80.57	99.02	87.41	71.29	71.96	67.99
江苏	52840	70.95	68.45	74.94	74.62	66.11	65.62	56.88
浙江	51711	70.96	69.26	73.48	84.17	66.97	69.05	44.83
安徽	20888	54.60	53.21	57.92	62.13	61.98	58.92	13.11
福建	40025	63.73	62.58	71.93	70.03	67.66	68.84	22.57
江西	21253	56.63	54.99	58.19	63.60	65.32	60.79	15.17
山东	41106	61.71	59.32	64.85	68.12	65.35	62.81	25.03
河南	24446	53.76	52.42	53.16	60.00	67.14	58.38	11.10
湖北	27906	58.08	56.68	61.63	61.97	68.69	56.05	24.82
湖南	24719	56.36	55.03	59.70	62.04	68.79	58.46	13.35
广东	44736	68.75	68.28	79.51	73.46	67.02	70.00	43.83
广西	20219	52.93	52.75	56.33	59.15	66.07	61.14	7.92
海南	23831	55.54	54.75	66.98	60.60	66.09	58.87	6.42
重庆	27596	59.49	57.51	66.93	60.83	65.76	64.67	17.68
四川	21182	55.92	55.18	59.65	59.05	65.80	59.34	22.08
贵州	13119	47.93	48.25	55.24	50.92	65.22	50.49	6.37
云南	15752	50.13	50.45	55.57	48.96	71.22	57.47	5.77
陕西	27133	56.14	55.94	61.03	54.72	69.23	57.16	29.26
甘肃	16113	45.58	46.04	52.17	48.92	62.84	44.95	9.55
青海	24115	45.82	45.95	57.26	49.02	64.38	39.66	5.80
宁夏	26860	49.92	48.71	59.67	54.76	62.36	44.64	8.89
新疆	25034	47.12	46.46	56.12	57.56	58.26	41.23	5.30

生指数 (单位为%)^① 来看, 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 (公众评价暂未开展) 六大方

① 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 (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x, DLI) 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内容详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12/t20131231_492765.html。在该体系中, 人均 GDP 作为三级指标纳入计算。

面,共 42 项指标。指数的计算与合成借鉴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等有关方法,根据各评价指标的上下限阈值来计算其指数,也就是无量纲化。指数为 0-100,根据指标权重合成分类指数和总指数。如果将 2010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综合发展指数排序结果与按人均 GDP 的排序结果进行对比,可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个别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排位与人均 GDP 排位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用表 1 和表 2 做相关分析,得出表 3。

表 3 2010 年各省市投资女性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平均在校受教育年数	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参加过培训的比例	获得过贷款的比例	上年的平均劳动收入
人均 GDP (元)	.712	.732	.375	-.653	.713
DLI (调整后)	.593	.616	.330	-.744	.668
综合发展	.602	.632	.366	-.728	.675
经济发展	.685	.687	.405	-.650	.697
民生改善	.538	.602	.332	-.746	.705
社会发展	.519	.460	.254	-.425	.177
生态建设	.237	.303	.109	-.681	.429
科技创新	.635	.660	.434	-.683	.723

提升女性人力资本、使女性投身到有酬劳动和各省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中度的相关关系^①。我们无法说明这种相关的因果性,但中度相关表明,投资女性教育、促进女性就业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联系^②。有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并最终促进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又使居民对幸福的感知产生差异(黄嘉文,2013)。

(三) 让女性成为有产者——女性创业

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理论认为资产积累是重要的福祉。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政

① 统计学表明,线性相关系数 r 为: $|r| < 0.3$ 表示关系极弱,可以认为不相关;当 $0.3 \leq |r| < 0.5$ 时,说明二者低度相关; $0.5 \leq |r| < 0.8$ 则属于中度相关; $|r| \geq 0.8$ 表示高度相关;而 $|r| > 0.95$ 说明存在显著相关。

② 相关系数的平方即为决定系数,它表示因变量的变异中可由自变量解释的百分比。决定系数代表的拟合优度越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自变量引起的变动占总变动的百分比越高。从方法论的意义来看,相关系数是衡量两个变量的线性依存程度,测度不含因果关系的对称相关关系;决定系数则是说明自变量或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表征不对称的因果关系。

策是不充分的，还应当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政策，它带来的福利效应包含了除潜在消费之外的其他经济、社会和心理效应（谢若登，2005）。

让女性成为有产者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投入。2010年，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我国仅有13.2%的已婚女性在房产上只登记了自己的名字，而51.7%的已婚男性会这样做，当代城市房产分配的状况形成了新的性别不平等，性别差距在扩大。在家族企业中延续的长子继承制传统也直接在心理层面影响女性的职业规划和社会化（傅颖、王重鸣，2014）。表1显示，女性获得贷款的比例明显集中于老少边穷地区，其主要内容是与扶贫相关的小额贷款。在城市中，女性获得贷款的比例极低，且越发达的地区女性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少。女性获得贷款比例最低的是上海，只有0.9%；其次是天津，为1.1%；再次是北京，为2%。从表3来看，各地各类型的发展都与女性获得贷款的比例呈负相关。

2010年曾经获得过生产经营性贷款的性别比例分别为女性9.0%和男性14.0%。从贷款来源看，其中女性获得的是商业贷款、政府贴息等形式小额贷款的比例分别为49.9%和37.3%，男性则分别为52.0%和36.9%。农村女性获得政府贴息等形式小额贷款的比例，则为39.9%。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末，全国累计发放的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300多万人次，为妇女提供了创业启动资金，辐射带动近千万妇女创业就业（中国非政府组织CEDAW报告撰写小组，2014）。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实施，还使得农村留守妇女获得信贷的机会得以提高（蒋月娥，2011）。

女性创业和获得资产增长有利于个人、家庭和社区发展。2008年3月，高盛基金会在中国启动了“巾帼圆梦”计划，他们总投资金额1亿美元，为期5年，为世界各地的1万名有发展潜质但资源匮乏的创业女性提供商业和管理培训。中国已有2100余名女性小微企业主接受了项目培训。高盛的跟踪数据显示，在参与项目后，大部分参与培训的女性创业者的公司得到了发展。完成项目培训的75.4%的学员表示，公司收入得到提高。她们的企业收入增长率中位数值从培训结束6个月后的25%增长至18个月后的85.3%，30个月后又提高了261.8%。平均业绩增长率分别是133.3%、383.6%和1336.8%。创造就业机会的成果也极为显著，57%的学员在培训后6个月开始通过企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业的增长率在完成课程后18个月和30个月后增至67%和78%。学员企业的平均雇员从4.9人增至18个月后的7人、30个月后的13人。

2015年1月27日,世界银行集团成员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rporation, IFC)、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与高盛“巾帼圆梦”万名女性创业助学计划推出中国首个专门的女性互联网金融贷款服务项目。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网、天猫等电商网站的数据显示,女性经营的店铺符合信用贷款准入条件的比例略高于男性经营的比例,女性店铺的准入比例为50.10%。在蚂蚁小贷的贷款客户中,女性的比例达54.43%。“女性在使用贷款时更加慎重,出现不良贷款的概率也更小一些”(姜樊,2015)。

女性的创业活动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亦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创新带来活力。以北京的“巧娘工作室”为例,作为促进妇女创业就业的公益服务项目,它吸纳了一批具有一定手工技艺的妇女参与到创业活动中。该项目自2006年正式启动,迄今已有270多个“巧娘工作室”在北京市的市、区两级建立起来,产品涉及刺绣、剪纸、手工编织、雕刻等近20个种类,直接安置妇女就业近5万人,带动妇女就业和灵活就业26万多人。海淀巧娘工作室蒋丽娟的手工绣花鞋屡获国际大奖,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她的绣花鞋以每双2100欧元的价格被收购^①。

(四) 重新定义家务劳动和重估关怀工作的价值

在我国,家务劳动从未被计入GDP的统计,但家务劳动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城镇双职工家庭中,有67.2%的家庭的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佟新、周旅军,2013)。同时,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已形成一个达5000万人左右的群体。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报告》,留守妇女承担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比例都超过85%,此外,她们还大量承担了子女养育、老人赡养等家庭责任和社区事务(李永杰,2014)。对18-59岁城乡女性的家务劳动价值的测算发现,城乡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远大于男性,城乡女性家务劳动的总价值非常可观,达到2.31万亿至2.95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为5.75%-7.35%左右(杨慧,2015)。家务劳动的经济贡献应纳入国家GDP的统计中。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贡献者,她们的劳动价值需要得到公正评价。如果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GDP统计,应有4万亿元左右的价值回馈给女性,不仅能够使经济充满活

^① 《巧娘工作室》一文由北京社会建设网2014年4月25日编辑报道(<http://www.bjshjs.gov.cn/412/2014/04/25/74%4013950.htm>)。

力，更能促进性别平等。

我国社会存在着对关怀工作的巨大需求。据联合国的保守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3%，达到3.34亿，最需要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高达1亿，而2005年，这三个数字分别为7.7%、1.06亿和1300万（曾毅等，2010：1-2）。居家养老模式需要家人付出关怀劳动。

女性承担着生育和抚育的责任，完成着人类自身生产活动，但其社会价值和贡献并没有得到承认和补偿。对生育价值的公正评价和合理补偿需要我们用关怀伦理理解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妇女和家庭为社会承担生育和抚育责任，应当成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1994年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补偿办法》，但缺乏法律强制力。目前，我国可以享受生育补偿的范围很小，只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正式工作的女职工，而乡镇企业、街区企业、个体经营者、非正式就业者和广大农村妇女都无法享受到生育补偿，这是每一个生育妇女都应该得到的补偿和承认（范红霞，2010）。我们倡导，对女性的生育贡献进行经济补偿，这种补偿应以公平和广覆盖为原则，参考医疗保险的做法使全体公民的生育贡献得到国家的认可。这一补偿资金看似是财政公共的巨大开支，但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不仅使生育妇女得到补偿，还使家庭及其老人和孩子们受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有流动儿童3581万，有留守儿童6972.8万（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2014：13）。当父母为了生育和抚育的责任不得不外出打工时，国家要为儿童的未来付出更大成本。承认和补偿家庭在生育和抚育上的贡献，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关怀伦理在我国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国人重视代际和人际联系的重要原则。从关怀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我国新常态下的增长路径有重要意义，这要求我们将与人的再生产有关的医疗照顾、老人照顾、生育补偿、婴幼儿照顾等需求视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承认和鼓励关怀劳动；这其中，投资女性既有利于性别平等，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之幸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艾斯勒，理安，2009，《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高钰、汐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波兰尼，卡尔，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蔡昉, 2009,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诺克斯, 大卫、卡洛琳·沙赫特, 2009, 《情爱关系中的选择——婚姻家庭社会学入门》, 金梓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戴秋亮、詹国华, 2010, 《关于家务劳动产出核算的探析》, 《统计与决策》第20期。
-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2011,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2011,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研究》第9期。
- 范红霞, 2010,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妇女生育价值社会补偿的探索》, 《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傅颖、王重鸣, 2014, 《女性继任家族企业研究回顾与展望》, 《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观熙, 2015, 《追问女性职场进阶之旅》, 《中国妇女报》1月30日。
-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2012, 《中国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事实和数据(2012)》, 国家统计局刊发。
- , 2014, 《2014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哈特曼, 海迪, 1997, 《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 载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北京: 三联书店。
- 黄嘉文, 2013,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社会》第5期。
- 姜樊, 2015, 《阿里进军女性小微贷款》, 《北京晨报》1月30日。
- 蒋永萍、杨慧, 2013, 《妇女的经济地位》, 载宋秀岩、甄砚主编《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 蒋月娥, 2011, 《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妇运》第8期。
- 李永杰, 2014, 《统筹城乡发展关爱留守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报》1月29日。
- 童梅、王宏波, 2013, 《市场转型与职业垂直性别隔离》, 《社会》第6期。
- 佟新、周旅军, 2013, 《就业与家庭照顾间的平衡: 基于性别与职业位置的比较》, 《学海》第3期。
- 吴伟, 2012, 《中国女官员“橄榄形”格局待解最高层和基层比例很低》, 新华网3月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3/08/c_111618850.htm)。
- 吴愈晓、吴晓刚, 2009,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谢若登, 迈克尔, 2005, 《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 高鉴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扬, 艾里斯, 1997,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理论的批判》, 载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北京: 三联书店。
- 杨慧, 2015, 《中国女性的家务劳动价值研究——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 载谭琳、姜秀花主编《家庭和谐、社会进步与性别平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慧、蒋永萍, 2014,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经济地位的变迁——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中国妇运》第3期。

- 曾毅等, 2010, 《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张成刚、杨伟国, 2013, 《中国职业性别隔离趋势与成因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中国非政府组织 CEDAW 报告撰写小组, 2014, 《中国非政府组织 CEDAW 报告》, 未发表。
- 周颜玲、凯瑟琳·W. 伯海德主编, 2004, 《全球视角: 妇女、家庭和公共政策》, 王金玲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Beck, Ulrich 2000, *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lair-Loy, M. & A. S. Warton 2004,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Constraints on Work-Family Policy Use: Corporate flexibility policies in a global fir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7 (3).
- Engster, Daniel 2004, “Care Ethics and Natural Law Theory: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theory of car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6 (1).
-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rz, A. 1999,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Hochschild, Arlie 2012, *The Outsourced Self: Intimate life in market time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Ironmonger, Duncan 1996, “Counting Outputs, Inputs, and Caring Labor: Estimating gross household product.” *Feminist Economics* 2(3).
- Lambert, Susan J. 2000, “Added Benefits: The link between work-life benefits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5).
- Noddings, Nel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2,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ltz, Paul 1995, *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illy, Louise & Joan Scott 1978,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Waring, Marilyn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佟新)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学系 (周旅军)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马冬玲)

责任编辑: 梁萌